

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扶贫基金会在临县开展活动

在中央法委会离开后甘泉村50多年后的1998年6月12日,年近90岁高龄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同志一行,来到了后甘泉村,走访了他们当年住过的土窑洞,拜见了当年的亲人故友,并捐资10万元人民币,为后甘泉村新建了一所两层楼的标准化学校。她说,“饮水思源不忘甘泉,我要为老区人民代言。临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我们要切实解决老区的贫困问题,把革命精神广泛的宣传,让革命传统之树万古长青,让革命情谊之花永开不败。”

2018年11月7日,以老红军王定国命名的“临县王定国扶贫基金会”,在革命老区吕梁市临县正式成立。王定国之子谢飘,林伯渠外孙齐放,王定国扶贫基金会创建者吴润泽同志,海垦集团副总经理张志坚,中铁十二局集团天津公司副总经理杨宪军,天津共富善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义,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临县县委书记张建国等有关领导和嘉宾应邀出席揭牌仪式,谢飘、张建国共同为基金会揭牌。

揭牌仪式上谢飘讲道:1947年,父亲谢觉哉等革命先辈在临县后甘泉村工作期间,我曾在这里跟随父母生活。母亲王定国特别关心老区的情况,90岁开始重走长征路,她在90年代也回到临县后甘泉村,并牵头捐款10万元建立了希望小学。她一直嘱咐我们要关心老区的建设。

谢飞表示,他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年跟随父母在临县后甘泉村生活过一年多的时间,当时只有五岁的年龄。他还说,母亲也会很高兴在临县以她的名字成立基金会,进行产业扶贫、教育扶贫。这使我们又跟父母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地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林伯渠外孙齐放应邀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他表示,我的祖辈70年前在这个地方工作战斗过,我们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我们积极参与基金会的工作,希望能够帮助老区人民,在共同致富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揭牌仪式结束后,基金会召开了理事会,会议审查了基金会章程,选举谢飘当选为理事长,吴润泽当选为秘书长,齐放当选为监事,谢军当选为理事,会议还选举了副理事长和理事当选人员。

王定国扶贫基金会是在党中央脱贫攻坚的号召下,在老红军王定国精神的感召之下成立,以不忘老区人民,感恩回馈老区,带领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为宗旨,推进老区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消费扶贫进程。

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为老区扶贫牵线搭桥,提供资源与平台,推动老区产业升级。2019年4月,王定国扶贫基金会在临县与枣园高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临县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响应国家和省委关于开展消费扶贫的号召,相信双方的合作能够有效推进临县产业扶贫、消费扶贫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37万枣农脱贫致富。2019年6月,王定国扶贫基金会精准扶贫项目200亿落地签约仪式在山西枣源地科技有限公司隆重举行。王定国基金会与枣源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一同签署了合作协议。

2019年9月8日,王定国扶贫基金会与西路军后代相聚召开座谈会,共同讲述王定国及西路军的故事。

百岁西路军老战士胡正先,百岁老红军王定国之子、王定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谢飘,南开大学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定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人吴润泽,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徐向前原秘书李而炳,王树声之女王宇红,刘瑞龙之女刘延淮,胡乔木之女胡木英,胡正先之女胡滨江,高台西路军纪念馆馆长朱德忠、宣教科科长王丽霞等应邀出席座谈会,共同商讨临县脱贫攻坚扶持计划。

谢飘在座谈会上表示,王定国扶贫基金会在临县成立至今半年多的时间,通过充分调研,很多工作已经就绪。我们在临县双塔村举行了学校的揭牌仪式,关注老区的孩子,希望老区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研究中心在临县挂牌党史人物研究基地,加强研究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和精神,深挖他们在临县的革命事迹,要传承好、宣传好、运用好。



王定国捐资为后甘泉村修建的希望小学

法委会在后甘泉村起草宪法草案的历史记载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四卷(上)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第64页:

1946年6月,书记处决定设由12名委员组成,以谢觉哉为主任的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简称法委会)。1947年1月,中央责成法委起草新民主主义宪法草案,供拟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讨论。2月3日,法委决定设宪法、法律两个组,并决定法委主任和组长组成常务委员会。

1947年3月上旬,法委撤离延安向晋西北转移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指出起草宪法草案要注意时代性、阶级性与群众性。3月下旬,法委人员先后抵达山西临县后甘泉村,对外代名为联大工学队。4月,法委开始起草全国宪法及研究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于10月间完成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指示宪法草案要待全国胜利后使用,这项工作暂告一段落。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明年谱》载:1947年8月至10月半,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丢开政协宪草协议原则,试图起草内容与形式皆为新民主主义的宪草,即所谓后甘泉后期宪草初稿。根据当时的形势,因中央当时无暇讨论及毛泽东指示宪草要待全国胜利后使用,于是法委会以后再未继续研究及修改这一初稿,这项工作暂告一段落。



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

《人民画报》2014年第11期,刊登了习仲勋、宋任穷、伍修权、王首道、马文瑞五位老一辈革命家为谢觉哉撰写的文章《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文章中写道:谢觉哉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期,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中央一大代表何叔衡一起被尊称为“苏区五老”。红军长征,何叔衡留在苏区,后被敌人杀害。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安时期,谢觉哉又与徐、董、林和吴玉章被全党全边区誉为“延安五老”。

“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新闻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

……1947年3月7日,根据中央决定,法委会撤离延安,转移到山西临县后甘泉村。在这里,冒着敌机轰炸,为迎接全国解放,起草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和其他几个法律草案。谢觉哉要求“新的法律,不只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而且形式也不能为旧的形式所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了解”。当年10月20日,谢觉哉带着这些草案,西渡黄河,重返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在佳县白云山上的中央临时驻地,谢觉哉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宪法和几个法律草案,从而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必要的立法准备。

“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年2月2日刊登了王兵撰写的文章《谢觉哉:“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

谢觉哉先后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担任领导职务,不仅是秉公执法的好法官,而且是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为法治建设留下了许多历久弥新的思想观点和实践经验。

1946年6月,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谢觉哉担任主任委员,委员包括林伯渠、徐特立、陈伯达等。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谢觉哉坚定而鲜明地指出:“合情合理,即是好法。”“中国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我们发誓努力做好立法工作以迎接你所指挥的伟大的中国解放的胜利。”1947年3月,法委会转移到山西临县后甘泉村。在这里,谢觉哉和他的战友们冒着敌机轰炸,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和其他几部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做了必要的立法准备。

上述两篇文章对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在临县后甘泉村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作了明确的阐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

本版稿件由王永卫整理